



简讯

(总第1期)

- ◇ **发刊词** 1
- ◇ **中心大事记** 2
- ◇ **时事评点** 4
- ◇ **成果摘撷** 13
- ◇ **学术透视** 18
- ◇ **中心简介** 24

顾 问：史晋川
金祥荣
主 编：叶建亮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RIVATE ENTERPRISE, ZHEJIANG UNIVERSITY

1/04

發刊詞

民營者，國之大事也，上及社稷安危之所立，下達黎民生計之所出，乃立國之本，富民之所依也。是故源於上古而潺潺不可絕也。然明清以降，工商抑末，外貿嚴止，又有列強，侵我國土，毀我民族經濟。百年戰亂，民不聊生。共和乃立，遂舉全國之力修復國事，是故國營爲統，而民營者微也。及至改革開放，政策大好，民營者如雨後春筍，迅速成長，國之經濟者，已然半壁江山。民營之發展遂成舉國之焦點。

吾浙江者，民營之大省也。地處東南，國力之所濟者，微也。然甌越之人，稟先人之踏實耕耘之精神，承搏擊沿海災害之氣概，行走四方，貿易往來，漸厚積累，並以家庭作坊，發展工業。由此漸進，歷經挫折而不餒，遂成大氣，所謂經濟民營者，十有八九矣。今之浙江，國民所得者位居前茅，發展速度者冠領全國，蓋民營經濟之功也。全國上下，乃至國際，無不稱奇。

吾浙江大學者，東方之劍橋也。求是務實，創新求知。紮根本土，深入基層，興調查研究之風尚，行理論實踐結合之態度，厚積薄發，以成研究之傳統。所以有識之士，遂聚共同之志，設立機構，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西文簡之 CRPE。又有同仁努力，碩果累累。教育部者，乃批准成立重點研究基地。何謂重點，冠於全國而響於世界也。是故兢兢業業，研究討論者不絕也。乃辦「CRPE簡訊」，記錄中心之發展歷程。何謂簡訊？簡者，速也，訊者，知也。中心發展事宜，迅速告知有識之士，吾刊之責也。故，相互交流，暢通建言，共同推動中心之發展，豈不美哉？

甲申歲末

中心大事记

(2004.9.1~2004.12.30)

● 2004年9月24日国务院政研室陈文玲司长访问 CRPE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陈文玲司长一行3人近日访问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听取了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有关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情况的汇报，对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向史晋川教授转交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魏礼群主任委托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有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函件。

● 2004年10月13日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张东刚教授来我中心 视察

国家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张东刚教授于10月12日视察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中心负责人史晋川教授、罗卫东教授等人对中心的机构设置及其运作状况作了全面汇报，并陪同张教授参观了中心的工作场所。在参观过程中，张教授仔细地检查了中心所展示的工作成果，与中心的有关教授进行了交谈，并亲自上网浏览了本中心网站。张教授对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2004年11月2日“2004西博会·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 隆重召开

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大学共同主办，杭州市建委、杭州市城市建设资产经营公司和 CRPE 联合承办的 2004 西博会·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于 11 月 2 日在杭州黄龙饭店隆重召开。本次论坛是今年杭州西博会投资合作周的主要会议之一，旨在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从微观层面破解城市建设的投入渠道、融资工具、补偿机制和造血机制。论坛由 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主持，杭州市副市长杨戌标致开幕词，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做主题演讲。在下午的专题研讨中，CRPE 和经济学院的有关研究人员与建设部、全国各城市建设部门、城市投资公司、金融机构的专家 100 余人，就当前我国城市建设投融资

体制、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公用产业民营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

● 2004年11月20日—21日“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浙江卷案例研讨会”召开

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浙江卷案例研讨会，于11月20日—21日在杭州百合花饭店召开。本次会议是在浙江卷15个案例初稿形成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的宗旨是召集国内民营经济研究的著名专家对每个案例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会议由张曙光教授、盛洪教授、金祥荣教授和史晋川教授轮流主持，近40位与会专家本着实话实说的精神对每个案例都进行了全面的“会诊”，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最后对案例研究的学术目标、案例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 2004年11月26日CRPE正式获批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文件（教社政函[2004]50号）

教育部关于公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第五批入选机构名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其他有关重点研究基地依托学校：

按照我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通知》（教社政10号）要求，经有关高校推荐申报、我部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和实地考察，现批准第五批27个科研机构列入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对于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科研体制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入选机构及其所在学校，应认真按照《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和《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的建设标准加强建设，使重点研究基地的体制改革、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信息资料、咨询服务等项任务得到全面落实，尽快提高重点研究基地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能力。

时事评点

● “外观”成为贸易壁垒 中国文具遭到美企诉讼

2004年09月01日《解放日报》报道：近日，美国著名文具企业Sanford公司指控全球12家企业，认为它们出口美国的标记笔侵犯其“商标和商业外观”，目前已由美国ITC(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立案。宁波贝发集团等中国4家企业被列上被告席。

据悉，“商业外观”是美国特有的贸易保护主义“337条款”中的一项，除版权、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外，美国有权对进口产品在外观相似性上提出质疑。此次Sanford公司正是凭借此条款，指控中国贝发标记笔侵犯了其“商业外观”。

对于该指控，中国几家涉案企业都忿忿不平，认为美方纯属刁难。事实上，关于“商业外观”概念，在美国本国都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仅笼统地规定：“消费者根据外观，立刻能辨别出某产品与某著名品牌有类似性的，即属侵权”。而最终裁定，也由法官拍板敲定，颇似“霸王条款”。据了解，中国制笔企业出口前算得小心，进入美国市场前曾到美国专利局、商标库里查询，如此步步谨慎，竟仍防不胜防。

美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利用这一特有的法律频频对中国商品设置障碍，其真正目的不在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在于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据了解，贝发涉案的那款笔在沃尔玛上柜仅2个月，其销量就是Sanford公司那款“类似笔”的7倍！贝发认为，消费者绝不会混淆外观，而是因为两种笔质量不相上下但价格相差20%，最终选择了物美价廉的中国笔。耐人寻味的是，在Sanford所指控的另外11家公司中，有韩国企业，也有一些美国的进口商，但沃尔玛亦是贝发的进口商，Sanford却有意避开直接同巨人沃尔玛抗衡。据宁波市外经贸委副主任俞丹桦分析，Sanford猜准中国企业的心思：对中国企业恶意骚扰一下，中国企业考虑到高额官司成本以及在美较低的销售量，大多会放弃应战，那么市场份额便拱手相让了。

可这回，Sanford的算盘可能打错了。贝发准备采取几步走策略。第一步，质问所谓“商业外观”侵权是否成立？按照法律程序，得做民意调查——是否一眼就会把贝发的产品错认为是某“著名商品”？第一步走不通，再据理力争两种笔有显著差别。因为贝发已非常明显地标有自己商标，在外形上也有明显不同。“不排除裁定的任意性和偏向性，这取决于法官的个人素质，但我们仍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权利！”周杰说。

宁波外经贸委副主任俞丹桦告诉记者，在国内企业众多对外贸易反击战中，浙江算是“高发区”，而浙江的龙头企业往往揭竿而起，逢案必应。记者发现，一些行业老大，还会主动

与同行小弟沟通——“应诉我找到3条理由，你们还有吗？”国内一位外贸专家说，从长远来看，暂时的躲避，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记者 李晔）

CRPE 观点：与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后特别保障措施等作为替代壁垒的出现类似，在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文具领域，商业外观作为新的贸易壁垒的出现，反映的是传统贸易壁垒手段日益受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进程的约束而弱化，贸易保护制度安排不断创新。在应对新贸易壁垒的策略上，一是针对以法律形式出现实质反映经济竞争内涵的案件，必须全力应诉，谁应诉，谁受益。二是走出传统的价格竞争的策略定式，逐步转向品牌竞争，强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三是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在应对贸易壁垒中的主导作用。（严建苗）

● 阳光财富与民企原罪

2004年9月14日《重庆晚报》报道：2003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13日在北京发布，参照2003年福布斯和胡润公布的两张富豪名单，此次私企纳税百强中有11位富豪的身影，而不久前，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也发布了一个名单：2003年度重庆市诚信纳税先进企业110户。记者发现很多“如雷贯耳”的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从2004重庆企业100强这个名单上消失。

福布斯富豪榜告诉世人的是谁的财富多，纳税百强榜告诉世人的是谁对社会做的贡献大，诚信纳税榜告诉世人的是谁在真正依法经营。按照常规，这三个榜应该不会相差太远。但众多富豪在“百强纳税榜”隐身，众多登上“百强纳税榜”的企业却不能进入诚信纳税名单，为什么？

记者认为，关键在于民营企业的资本往往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胎记，他们通过权力转移资本非常容易。这就形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十分复杂的双重性格，既有独立不羁和积极创新的一面，也有与权力勾结、非法牟利的一面。将不合法所得合法地装入自己的腰包，于是造成三个本应体现一种“财富”的排行榜相差甚远。

CRPE 观点：细究资本积累的每一个细节，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家创业的过程是在一个完全的阳光下运行的。西方如此，中国亦如此。但是，当企业逐步发展壮大时，依靠原始积累的方式能否推动企业长期成长和财富积累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企业诚信与否，是否偷税漏税，是否采取非正常手段聚敛财富等等必须放置于整个社会与市场的制度环境和交易生态视角下考察，方有意义。因为企业永远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最大化可能是远期

的，也可能是近期的。我们不可能教化企业家不要追求近期利益最大化，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和交易环境，让他们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成为其最有利的选择。于是他们会诚信纳税，于是他们会诚信交易。（YJL）

● 西班牙发生烧鞋事件 十几亿元温州鞋遭威胁

2004年9月23日《温州新闻网》报道：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当地时间9月16日晚7点多），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据温州相关企业知情人士说，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国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鞋子烧掉”。不法分子在看到青田鞋商陈九松的仓库外停着一辆满载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后，放火烧掉了装有鞋子的卡车和陈九松的店面、仓库。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16个集装箱，造成经济损失约800万元。

西班牙埃尔切市中国鞋城的50多位中国鞋商和鞋城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中国驻西班牙使馆目前已派员组成处理小组赶赴埃尔切市，与当地警方进行严正交涉。当地警方当晚已拘捕了10名肇事者。

■ 外贸温州鞋不完全“厄运录”

-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俄罗斯曾发生过一次查扣事件，温州东艺鞋业卷入其中。那次查扣货物历时最长，整个浙商损失大约3亿元人民币，个别企业损失达千万元以上。
- 2003年冬，业界盛传20多家温州鞋企的鞋类产品在意大利罗马被焚烧。损失不详。
- 2004年1月8日，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禁止进口商品名单”，90天后，新列入名单的41种商品被禁止进口和销售。已在尼日利亚的温州鞋，损失至少数千万元。
- 2004年2月12日，俄罗斯内务部出动大量警力查抄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包括温州鞋商在内的中国商人，此次损失约3000万美元。

CRPE 观点：中国人一直以价廉物美为生意的制胜法则，这种观念古而有之，根深蒂固。所以当价廉物美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不测时，所带来的震惊不仅仅是货物损失本身，还包括这种根深蒂固观念被冲击后的不知所措。的确，当我们千方百计的降低工人的工资，躲避高额的环保成本，简约大量的营销投入，试图以最低的成本挤占国际市场时，我们似乎忘掉了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面对国际市场屡发的排斥，除了谴责，我们恐怕更需要认真审视我们自身的市场定位和竞争策略。逐步提升产品档次，走品牌化营销策略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立足竞争的新标向。

● 浙江省打造职业经理人队伍

《钱江晚报》2004年9月29日报道：高素质职业经理人的短缺一直是浙江省人才市场上的热点问题。近日，浙江省人才市场、浙江省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联合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在全省开展职业经理资质评价培训工作。

目前全国共有工商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严重匮乏；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许多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本次培训，职业经理资质证书由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和职业经理研究中心共同颁发，依据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新的人才标准，对职业经理的品德、知识、能力、业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与评价。

CRPE 观点：随着企业规模增长和市场竞争加剧，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缺乏的问题日益凸显，它与高级技工短缺问题一起构成了目前困扰民营企业的一大要素约束，此事浙江尤甚。然而，我们却从来不认为政府能够帮助企业培养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也从来不认为政府能够对职业经理人作出正确的评价，尤其是当这些工作与资质、证书、考核等功利性目标相联系时。在我们看来，职业经理人从来就是由残酷的市场竞争来打磨和筛选，由企业家给予的薪酬高低来评价的。而且，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确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成长起来，市场对于每一个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而言都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需要用经验、胆识、敏锐和智慧才能战胜。任何MBA教育只是帮助他牢牢地抓住每一块石头，而无法提供过河的“通途”。（渔民）

● 民营企业大步走上国企振兴前台

据黑龙江《生活报》2004年10月11日报道：近一年来，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一批民营企业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大步走上振兴黑龙江老工业基地的前台，唱起了“主角”。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661.8亿元，同比增长11.8%，比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高出1.2个百分点，全省经济总量增长中的3.7个百分点是由民营经济拉动的，民营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为35%。

在“振兴”战略中，民营企业紧紧抓住国企改革这一有利契机，采取重组、收购、合资和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六大基地”建设。今年上半年，全省就新增私营

企业 7680 户，大企业户数达到 100 多户，年销售收入 5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增长 62%；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1.6 亿元，参与了 32 户国有企业改革，盘活国有存量资产 17.5 亿元，安置下岗职工 2.3 万人。

据哈尔滨企业调查队近日调查显示，该市 76 户重点企业集团中的 31 户民企多路参与国企改革，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 户，已占全市 76 户集团的 40.8%。哈工大集团通过市场竞价的方式收购了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十大乳品企业之一的黑龙江乳业集团，使哈工大集团资产总计达 152.9 亿元。目前，总投资高达 23.3 亿元的哈尔滨四海数控集团的新型建筑材料制造生产线、哈尔滨光宇集团的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等 12 个项目，已列入向国家推荐的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名单。

同时，黑龙江省及时出台了 25 条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省直各部门从有关专项资金中拿出的扶持金多达 3 亿元，有 17 个民营经济项目被列入省政府科技计划，获得省政府科技扶持资金 374 万元，获得 4500 万元的贷款支持，带动投资 1.19 亿元。

CRPE 观点：90 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公有制企业改制曾经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二次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过程开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得以大步推进。这充分说明：“国退民进”这一产权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不容置疑。同时，基于浙江和其他先行地区的经验，我们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这项艰巨的工程中必须充分重视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积极吸引、善于利用省外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参与本地国企改革，彻底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发展观念，不要在东北重演“天津狗不理”股权拍卖的闹剧；二是要在充分肯定国企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的前提下，杜绝内部人利用改制时机侵占国有资产的行为，实现对国有资产价值的科学合理界定。郎咸平教授对国企改革方向的质疑虽有杯弓蛇影、以偏概全之嫌，但他运用财务技术揭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却客观存在并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渔民）

● 民企致力民间外交 意义非同寻常

2004-11-10《中华工商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由于钓鱼岛问题、俄罗斯石油管道问题、东海油气资源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近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变得十分敏感。不但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也以非客观的报道，煽动民众的反华情绪。针对此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经济、文化交往，促进

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合作。

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率领 70 多位民营企业家访日。本次访问，不仅是民间交往，也是经济交流，而且，随着中国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民营经济在中日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不断提升。因此，此次访问非同寻常。

对中日经贸关系进行回顾和展望，可以这样评价：中日经贸交流持续发展、紧密度越来越高，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2000 年至 2003 年 4 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均增长速度 19.6%，今年 1 至 8 月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7.7%；在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比重方面，2000 年，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额的 9.9%，这一比例到 2003 年达到 15.6%。日本经济学家预测，几年之后日中贸易将超过日美贸易，中国将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日贸易的发展使得日本方面对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从负面转向正面。2001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其每年一度的通商白皮书中将中国经济比喻为“打乱东亚雁型发展的怪鸟”，2004 年的白皮书则肯定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并称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对华投资方面，近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金额持续增加，投资规模趋于大型化，在华日资企业 70% 以上盈利，中日贸易中的 60% 是日本在华的三资企业从事的（即所谓“日—日贸易”）。这些，都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一方面，从日本的角度看，日中经贸关系越来越重要，日本经济越来越需要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支撑；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在 2004 年发生重大逆转。

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 20% 左右，到 2003 年下降到 15.7%，今年 1—8 月又下降到 14.8%。1993 至 2003 年，日本连续 11 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今年以来，中欧贸易额、中美贸易额先后超过中日贸易额，日本一年之内滑落两级，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以上数据表明，中日贸易的发展速度，没有跟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说，中日贸易本该更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有经贸政策原因，更有政治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需要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东瀛之行，就是富有成效的方式之一。

CRPE 观点：对外经贸关系的地理方向受制于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2004 年日本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被欧盟所取代，双边政治比经济因素产生了更重要的影响。在中日政治关系为既定外交的僵持背景下，通过类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非官

方民间活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是一个现实和有效的选择。(严建苗)

● 王均瑶现象引人深思 过劳阴影笼罩企业家

2004年11月24日《文汇报》报道：11月7日，“胆大包天”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年仅38岁。王均瑶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他的死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企业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

王均瑶的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他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其命运关系到身后企业的兴亡和家族的兴衰；另一方面，王均瑶之死不是孤例，而是一个现象，它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精神和体力上普遍的过劳状态。

企业家被各类“商务病”缠身

在企业家中间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陪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看似潇洒，其实内心孤独。”看似调侃的描述，却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一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左右。他们在成就个人辉煌的同时，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完全靠自己打拼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是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疾病和痛苦。

首先是疾病侵扰。以冠心病、高血压为例，这些10年前以老年患者为主体的“老年病”，目前却成了以商务人士为主体的“商务病”。温州市某医院今年对87名知名企业家进行了体检，发现87人中，患有高血脂症者51例，高血压37例，高粘滞血症35例，颈椎病或椎间盘膨出31例，脂肪肝22例，冠心病6例，脑梗塞4例，糖尿病13例，高尿酸症9例，代谢综合征15例，前列腺增生15例。这些数字真切地反映出企业家饱受疾病困扰。

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在伤害着中国企业家的身心健康。商场竞争的激烈残酷，使很多企业家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3539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90%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企业家认为工作状态紧张。调查还发现，平均每4个企业家中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慢性疾病。许多企业家觉得内心孤独，甚至产生厌世心理。

CRPE 观点：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存在的健康危机，实际上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化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严重弊病。绝大多数的中国民营企业依然延续着的家长式的、包办一切的家族管理，再强的人也无法承受一个现代化企业所面临的全部压力和挑战。尽管这些企业家背后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创业经历，大都具有“拼命三郎”的精神。然而，“鞠躬尽瘁”结果

不仅不是企业通往基业常青的坦途，反而将企业的成长牢牢的锁锢于创业者的个体兴衰。于是，我们看到了类似诸葛亮的遗憾与悲哀。王均瑶的英年早逝，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耳边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现代经理人制度，并通过引智形成企业管理层梯队，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当务之急。（YJL）

● 浙江经济在“成长的烦恼”中猛醒

2004年12月29日《半月谈》发表文章指出，浙江省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正遭遇“成长的烦恼”。

首先是“四荒”考验

“地荒”。浙江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1%多一点，1979年以来，新减少的耕地面积达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现有耕地的30.4%。浙江普遍出现“用地难”，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

“电荒”。浙江已是全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去年，浙江全省发电量增加17%，外购电量增加51%，仍不得不拉闸限电。今年夏天，浙江缺电问题更为突出，城市里“商场停电梯，路灯开一半”，甚至许多交通红绿灯都不得不暂时“休息”。有关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超过一半的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

“技工荒”、“民工荒”。不少地方“10万元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技工荒”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今年骤然趋紧的还有“民工荒”。杭州的家政公司“三替搬家”要招10来个搬运工，一个月来上门应聘的没有几个。

“水荒”。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面临严重的“水荒”威胁。水质性缺水使得不少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生产用水。浙江慈溪、玉环等城市，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家庭异地购买瓶装矿泉水补充生活用水不足。地处海岛的玉环县，今年夏天花数千万元持续一个多月从外地买水，最高一天的买水费用达到22万元。

其次是辉煌背面的另一份“成本账单”

浙江省工商联今年上半年调查了全省近千家上规模民营企业，结果显示，企业的土地平均产值仅为每平方米4200元，有的开发园区对进园区企业要求仅是每亩产出15万元，每平方米仅225元。

不久前浙江统计部门一份《浙江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的报告显示，2002年浙江每亿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7.11万吨标准煤当量，而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48万

吨标准煤当量，高收入国家只有 2.9 万吨标准煤当量。

这份报告同时还指出，2003 年浙江省每生产 1 亿元 GDP 排放 28.8 万吨废水，生产 1 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 2.38 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产生 0.45 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几个指标分别比 1990 年增长 84.8%、3 倍和 1.3 倍。环境污染的加剧，不断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支出。2003 年浙江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 231.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支出占当年 GDP 的 2.5%。

CRPE 观点：浙江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烦恼”典型的折射出社会决策当局和社会群体对市场经济内涵的模糊。“用低价作杀手锏，用数量放大利润，速度越快越好”正是绝大多数企业和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塑造的基本认识。然而，低价扩张的甜头一以贯之，推迟了附加值意识的觉醒；简单的复制成为盈利之道，使得产业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贻误了战机；惟速度论，忘记了资源要素的入不敷出和环境的牺牲。“成长的烦恼”应让浙江省开始醒悟：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舞台，而应该以资源合理、协调、科学配置为前提。正如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所说的：“浙江的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允许继续沿袭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浙江这趟快速列车将会有跑不动的一天。”“如果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的总体生活却未能改善，或者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侵害群众利益的事司空见惯，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这趟快速列车会脱轨，会车翻人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总而言之，切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打造和谐社会方是浙江的市场经济从“成长”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YJL）

成果摘撷

- 史晋川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市场增进论视角对浙江台州的历史考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 年第 2 期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青木昌彦的市场增进论观点，以浙江台州改革开放 25 年来的发展历程为案例；着重分析这一历程中台州市政府在不同阶段，分别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了协调作用；即如何通过组织内和组织间的民间协调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论文最后也指出了该视角对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历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启示。

- 陈建军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同构及产业定位

中国工业经济 2004 年 2 期

内容提要：本研究从产业经济和市场体制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各次区域之间产业同构产生的原因，认为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同构有其必然性。过分夸大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们需要重视的是由产业同构所反映出来的制度问题，即市场机制的不完善问题。而这正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所在。进而以浙江为例，认为必须从长三角正在形成的广域产业集聚和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客观现实出发，在长三角次区域实行“趋同”的产业发展定位，进而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互动格局。

- 赵伟

加入 wto 的制度变迁效应——基于产业组织的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年 2 期

内容提要：本文以体制转轨动态进程模型为基础，借助产业组织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先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变迁模型，接着用此模型分析了履行“入世”承诺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分析表明，履行“入世”承诺对我国市场化制度转型进程具有加速效应，加速效应主要与 WTO 承诺的两个具体效应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市场准入效应；另一个是公平竞争效应。

● 汪斌

中国信息化的经济结构效应分析——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04 年 7 期

内容提要：信息化已经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首先依据信息化综合指数模型测算了我国近十几年来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估计了信息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带动度和对三次产业的差别影响，发现信息化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后将信息化细分为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和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渗透这两方面，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两方面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最后考察了信息化对工业内部若干典型行业的带动问题。通过上述逐层的定量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信息化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复杂影响以及相应的调整取向。

● 金祥荣

我民间投资区位选择变化及其实证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年 11 期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和聚集效应理论，通过建立局部调整模型，从当地的上一期民间投资数量、市场容量、政府规模及基础设施水平四个方面，对 1996~2002 年期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本期民间投资与前期民间投资数量、市场容量及基础设施水平都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政府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文还就各因素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王维安

发展融资性票据：效率与风险

中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2004 年第 5 期

内容提要：央行 2003 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票据融资已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在目前真实票据的签发量无法充分满足企业融资需要的情况下,是否应当放开融资性票据的使用,监管当局有必要从效率与风险的角度进行权衡。

● 罗卫东

地方政府行为与民间企业的成长——温州的经验与教训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4 年 5 期

内容提要: 现代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在于理性的经济主体的形成。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间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其出现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它离不开市场机制和政府的作用。从温州的实例来看,政府为民间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创设了多方面的条件,政府的作用不能替代。

● 蔡宁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演进:从“聚集经济”到“创新网络”

科研管理 2004年04期

内容提要: 企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地方性组织,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在许多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企业集群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基于对聚集经济本质的探讨,揭示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形成的静态优势向创新网络获得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培育创新网络的关键环节,为企业集群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 余逊达

党代会常任制:椒江的做法与思考

浙江学刊 2004年2期

内容提要: 椒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历经十四个年头后,由试验转为正式实施。本文将椒江的基本做法概括为五项制度,并根据椒江的实践指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可以更好地发挥党代会的作用,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对照邓小平关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构想和党的“十六大”关于促进党内民主发展的要求,椒江的做法还存在着不足,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 汪炜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

经济研究 2004年7期

内容提要: 信息披露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研究对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然而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明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本文运用2002年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16家公司数据,检验了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与其自愿披露水平的关系。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变量之后,本文结论显示: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 潘士远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市场均衡

经济学季刊 2004 年 2 期

内容提要:几乎所有研究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问题的文献都隐含着一家厂商在同一时刻只能提供单一质量水平产品的假设。本文在厂商可以同时提供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的假设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来探讨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当考虑到这一前提条件时,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程度可能并不像先前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么严重,甚至可能不存在。此外,模型也指出,消费者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将严重地影响到逆向选择的程度,财富数量与逆向选择的严重程度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在发展中国家假冒伪劣现象十分普遍的原因。最后,拟以浙江省龙井茶市场为例来验证本文所发展的理论。

● 曹正汉

精英人物影响社会制度演进的条件和机制——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个案

管理世界 2004 年 6 期

内容提要:1981 年以来,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一直实行公社制度。在市场环境中,崖口村民为什么愿意接受公社制度?这首先是因为,村民面临市场风险,而公社制度能够帮助村民应对市场风险。然而,应对市场风险的办法有多种,为什么崖口村采用了公社制度这种办法?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提出继续实行公社制度,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其二,由于陆汉满具有较高的廉洁程度和管理能力,使得村民们认为,公社制度提供的“就业保障”在效用上超过了实施公社制度的代价,故村民们同意实行公社制度。

● 张钢

招商引资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 年 3 期

内容提要:地方政府绩效的合理评估,一直是困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目前,在我国各地方出现的政府招商引资热潮,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指标尤为密切。评估指标的偏差,诱使地方政府追逐“经济业绩”,忽视本应承担的公共职能,并引发一系列

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动因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地方政府绩效的合理评估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 肖文

西方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运作方式

保险研究 2004 年 3 期

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金融证券化和保险金融化的趋势下,随着巨灾风险对世界保险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出现了一种新的金融创新工具——保险风险证券化。西方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都在积极研究保险风险证券化,开发包括保险债券、保险衍生产品等在内的风险转移工具来适应这种变迁。

- 陈国权

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创新——温州地方政府政策的演变与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2004 年 1 期

内容提要: 地方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的主体之一,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为背景,实证描述和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在突破旧制度约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显著跃迁性的特征。温州地方政府适时的政策创新,促使民营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创新逐步转变为正式制度安排,为民营企业从非法走向合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州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过程中,既符合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利益和制度知识,又符合了政策者的既得利益和意识目标,政策供给兼备了社会可行性和组织可行性,从而使得政策效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

——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

史晋川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不时地在充满各种争议的过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史晋川等，2002年)。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模式”已经从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本文提出的观点对于“温州模式”可能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将“温州模式”从一个“充分肯定”的话题再次转变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本文将首先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不同层面的各种现象的观察中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然后通过对历史制度分析(HIA)理论的阐述提出一个适合于研究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最后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来解释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有关问题，指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从温州经济社会近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三类比较明显而有趣的现象，据此，可以引申出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三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1、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本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确立了区域性的改革先发优势，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域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史晋川等，2002年)。但是，近 10 多年来，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温州人在有关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专业化分工程度之高，营销网络之密，市场竞争力之强，无人能够匹敌。

同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经济现象是温州区域内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势头已经开始

明显放缓。2003年1~9月份，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创业者为何大多固守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者说，温州制造业的演变过程是否会存在“代际锁定”？

2、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

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在温州的投资极少，温州本地的国有经济总量原本就不大。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目前在温州的工业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产值比重已高达85左右。但是，作为国家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温州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的“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10左右，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杭州市的1/5。况且，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也仅只有宁波市的1/4，杭州市的1/3。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不要说国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在当地投资办企业。

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时代，在温州这块充满商机的热土上，为何缺乏外来的投资者，是不是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

3、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

温州人在历史上就具有经商的传统，封建社会的“海禁”及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压政策，都没有能够消除铭刻在温州人骨子里的商业精神。改革开放后，温州人已成为国内许多地区“温州商城”和工业园区的创办者，也成为内地众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甚至有温州企业家被当地政府授予“名誉市长”和“名誉县长”。近10多年来，与温州本地缺乏外来投资者进入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地闯荡，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到欧美各大城市的“唐人街”，甚至纽约币意大利商人的据点“小意大利”，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活跃的身影。

由此引申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温州人为何要满世界地跑，或者说，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的生意网和“海外生意网”。

二、理论框架

市场与分工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交易是研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活动及市场运行机制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之一。任何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都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可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克服市场交易活动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诺思，1999年）。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历史时发展出一个新的经济史学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创造性地将历史经验归纳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起来，以博弈的多重均衡为纽带把历史经验与逻辑解释融为一体（格雷夫，2002年），历史制度分析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夫纳·格雷夫教授运用这一理论框架研究了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围绕看远距离贸易中交易合约的缔结与执行，阐述了不同的合约执行机制形成及其基础。

活跃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马格里布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按照格雷夫的说法，马格里布商人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的“联盟”，联盟的成员雇佣其他成员或被其他成员雇佣，而非联盟的成员则无法雇佣联盟的成员或被联盟成员雇佣（格雷夫，2003年）。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是一种非匿名者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机制，即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作出集体性的永久和彻底的惩罚。格雷夫也将维护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制度称为“多边声誉机制（MRM）”和“多边惩罚机制（MPS）”。

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还有热那亚商人，他们信奉的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热那亚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并不局限于仅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不排除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热那亚商人通过创立了“社区责任制”及相应的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格雷夫将这种维护匿名者之间合约执行的机制称为“双边声誉机制”BRS和“双边惩罚机制”BPS，或者说，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从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商人群体运用不同的交易或合约执行机制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历史来看，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在地中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有关人格化交易方式与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理论，可以对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现象观察中所提出来

的三个问题作出初步的理论解释。

1、“代际锁定”的解释

温州经济发展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当然与温州的历史文化禀赋及商业传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企业家所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所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所了解熟悉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所依赖的市场网络也相同。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高度的相同存在于“代际”之间呢？其原因与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后代也一定在马格里布商人联盟中“子承父业”用同样的交易方式从事贸易活动是完全类似的。

温州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温州走向外地去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可是，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因此，温州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和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它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大新的行业。因为，对温州人而言，进入新的行业即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将可能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及经营风险。可以说，“代际锁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温州人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

2、“不可触摸的网”的解释

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两者所编织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一方面与温州的历史、地缘、血缘、文化、宗族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样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有关。当然，前者也是后者形成的必要条件。

地中海贸易史中马格里布商人联盟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是在一群有着共同文化和信仰的商人群体中发生的故事，它不仅与政府无关，反倒恰恰是由于缺乏政府的产物。可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这一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温州当地的部分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当然也不排斥帮助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政府官员的这种行为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事实上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

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不仅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3、“海外生意网”的解释

近年来，温州经营企业的外迁和民间资本的外流，固然与温州当地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约有关，也与民营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得不到更为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支持有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

历史制度分析表明，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商人群体在向原有区域之外的地区进行贸易扩张时，必定要借助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完成贸易扩张。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贸易扩张就同时伴随着马格里布商人联盟成员的移民，原因在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维系无法离开一个特定的人群。同理，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温州人的生意网也只能在温州人之间编织，结果是温州人的生意扩张伴随着温州人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事实上，绝大多数走出温州到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温州人，大都仍是在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和商贸活动，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影响力。

三、结论与启示

从历史制度分析的埋论视角来观察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可能的演变趋势，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

1、从温州经济来看，温州的经济制度变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极可能导致温州制造业的“锁定”，引发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2、从温州人经济来看，已经移民至温州之外地区的温州人，尤其是已经移民到海外的温州人，在他们体验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更多好处后，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非人格化交易方式来从事经济活动。此外，海外移民的第二代由于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成长，接受了新的文化知识，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传统行业及利用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数会愈来愈少。

由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上述两大演变趋势，可以断言，温州的人格交易方式将在此后1~2代人的时间内不断地加快融大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中，从而最终趋于消亡。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关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的

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具有重要的启示：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和中期确立了改革先发优势的地区，倘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继续保持自身的体制优势或者进一步开拓新的体制优势，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了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略）

（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二期）

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英文名：Center for Research in Private enterprise, Zhejiang University；简称：CRPE）是在教育部的关心支持下，由浙江大学组建的我国高校首家以民营经济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与政策研究机构。

CRPE 以对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案例研究为起点，把学术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当今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现象；CRPE 致力于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和分析工具，解释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现实进程，剖析民营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经营方略；CRPE 致力于组织和促进民营经济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推进我国民营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务研究水平；CRPE 致力于发展与民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宣传和推广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典型范例，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的咨询及教育服务。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9 月 28 日成立以来，秉承“扎根实践沃土，营造学术高峰”的宗旨，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主要对象，通过机制创新整合国内外一流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活跃的学术调查和理论研究活动，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牌。CRPE 正日益成为中国第一流的民营经济研究和咨询机构。

理 事 长：张浚生
主 任：史晋川
执 行 主 任：金祥荣
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曙光

理 事 会：由专家理事和企业家理事组成，专家理事由著名学者、政府部门官员担任，企业家理事由著名民营企业企业家组成。

学 术 委 员 会：由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任主席，史晋川教授、金祥荣教授、汪丁丁教授、盛洪教授等 5 位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研 究 团 队：现有专职研究员 20 名，兼职研究人员 14 名，其中博导 16 名、教授和副教授 28 名，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内外著名院校的博士学位。

学 科 基 础：浙江大学对民营经济问题的长期研究基础，依托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博士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组 织 结 构：设秘书处，负责日常运行、科研组织管理和信息咨询服务；设有 4 个研究所，包括：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研究所、民营经济与政府治理研究所和民营经济与国际化研究所。

本简讯全部内容可免费登陆
<http://www.crpe.cn> 阅读或者
致信致电本中心索取。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地 址：杭州市浙大路 38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四楼

邮 编：310027

电 话：(086) -571-8975-2835

传 真：(086) -571-8975-2835

电子信箱：crpe@zju.edu.cn

网 址：<http://www.crpe.cn>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